

新加坡書院 (1823-1867) :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新加坡的教育發展*

曾凱文**

摘要

本文以新加坡書院 (Singapore Institution, 1868 年改名為 Raffles Institution) 為例子, 探討其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統治期間 (1823-1867) 的教育發展情況。此案例透過探討殖民者創辦教育的背景、目的與影響, 以反思殖民教育的歷史書寫。本文以新加坡書院年度報告為主要史料, 從公司資助、教育理念、學生背景、以及教育內容等切入, 以探討殖民教育的發展脈絡。此研究也希望能夠藉此案例回應更廣大的帝國史問題, 即強調殖民方並非是全然的強勢壓制者, 並同時也注意到各方群體之間的互動, 進而揭示帝國本身也非一個單一的結構。

關鍵字：新加坡書院 (Singapore Institution)、英國東印度公司、萊佛士 (Thomas Stamford Raffles)、教育、帝國史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22 年「第 24 屆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學術研討會」, 感謝主持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陳尚懋的評論。本研究十分感謝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兼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白偉權對於本研究所給予的建議, 特別是針對文章內容與章節架構的指正, 衷心感謝。最後, 本研究也在投稿後獲得兩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與修改建議, 讓本文更為完善。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1823 年 4 月，萊佛士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 舉行一場有關創辦書院的會議。會議中，萊佛士提出把馬六甲的英華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搬遷到新加坡，並與在新加坡創建的馬來書院 (Malay College) 合併組成新加坡書院 (Singapore Institution，下文將簡稱為書院)。但萊佛士離開新加坡後，無人主持大局，且缺乏資金，導致辦學失敗。1834 年，一位牧師 Reverend F. J. Darrah 倡議創辦新加坡的教育，組成「新加坡學校會」(Singapore School Society)，最終在同年的 8 月 1 日在簡陋的校舍開校辦學，由穆爾 (John Henry Moor, 1803-1843) 管理，名為新加坡義學 (Singapore Free School)。1836 年，萊佛士紀念碑基金會 (Raffles Monument Fund) 召開會議，基金會成員認為完成萊佛士於 1823 年的教育目標是紀念他最好的方式，故決定利用基金建造新的建築，隔年 12 月把新加坡義學搬遷到新的校址，並以新加坡書院義學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為名，可見萊佛士所計劃的新加坡書院一名被納入校名之中，也說明此校的源頭。直到 1860 年出版的報告中顯示其名字改為新加坡書院 (Singapore Institution School)，而後來在 1867 年，書院的名字再改為萊佛士書院 (Raffles Institution)，但改名的原因不明 (Buckley, 1902; Wijesingha, 1963; Makepeace, Brooke, and Braddell, 1991)。直到今天，萊佛士書院依然是新加坡的名校，並繼續在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新馬 (新加坡與馬來亞) 教育史中，一般對於教育發展的分期可分為四個時段，分別為：第一階段由傳教士主導，而政府不多加干涉；第二階段為政府開始提升對教育的關注，並開始與傳教士合作；第三階段是在一戰結束後，英國政府重新反省並重組教育 (1918-1939)；而第四階段為二戰前後政府對教育的控制加強 (Ratnavadivel, 2007)。關於第一與第二階段的教育發展論述卻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有的學者認為這時段教育主要由傳教士主導，故此時的殖民教育以傳教為主 (莫順生, 2000: 27)。另外，有的學者認為英殖民教育是為了培養公務員和技術人員等，以方便統治，並且作為傳教的場所 (廖文輝, 2017: 274)。然而，這種論述無法完全表現出殖民初期的複雜面貌，如在地人的反應等。當時，傳教士與殖民當局兩者是混雜在一起，殖民者本身也並非是單一

的結構，而是有著不同背景的人們在其中。為此，本文從新加坡書院切入以探究新加坡早期，即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下文將簡稱為公司）統治期間的教育發展狀況。本文選擇此書院為研究對象，因為它不但是新加坡最早的西方教育機構，也是學生最多以及公司政府資助最多的學校，故有一定代表性（*Jarman, 1998: 217*）。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有部分研究以新加坡書院主體來進行歷史討論，如 *Charles Burton Buckley*（1902）的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最早討論到書院發展的歷史，此書同時具有二手研究和史料的性質，因作者去古不遠並掌握著一手史料並記錄在其書中。雖然此書用一個章節的篇幅來討論書院，但只是敘述其發展的歷史，並沒有進行太多的評論。另外，*G. G. Hough*（1933）的〈*The Educational Policy on Sir Stamford Raffles*〉也是屬於早期有關新加坡書院的研究，但他把焦點放在萊佛士的教育政策，故只討論新加坡書院的創建初期之理念。此外，*Eugene Wijesingha*（1963）的 *A History of Raffles Institution 1823-1963* 是少數針對新加坡書院歷史的研究，雖然作者嘗試把書院放在海峽殖民地的教育史脈絡中，但其主軸仍然以書院編年史為重，且作者的觀察視角注重在董事會的運作，觀點也較為偏向於書院的發展是為了大眾所需，並和殖民當局有著矛盾。除此之外，*R. L. O'Sullivan*（1988）的文章〈*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nd the Early 'Singapore Institution'*〉主要是討論英華書院和新加坡書院之間的關係，由於作者的主軸是探討以上兩所書院的關係，因此新加坡書院的討論也僅局限在創建初期，即萊佛士和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進行商討合作的時期。總的來說，除了 *Hough* 與 *Wijesingha* 的著作有較為明確的觀點，即強調萊佛士對於教育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書院對於教育的貢獻，其他的研究都主要放在考證書院的發展狀況，所以本研究從大框架出發把新加坡書院放在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的時間脈絡下進行討論，以填補此書院論述性不足的問題。

20 世紀末以來的帝國史研究開始反思與擺脫過去中心的視野，而逐漸關注區域間的連結和注意過去被邊緣化人群的經驗（*Bayly, 1989; Porter, 1999*）。帝國不再是由中心所規劃的產物，而是由各方拉扯所形成的。這種視角也延續到 21 世紀，例如研究者關注移民、思想、知識等網

絡，並將這些網絡視為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Ballantyne & Burton 2005)。不但如此，帝國的擴張是由多元人群和各地互動所產生的結果，而且帝國內部的各個區域之特殊性也被強調 (Darwin, 2011)。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並非是純然的鐵板一塊，內部的情況是更為複雜的。本文則將會從帝國史研究方向的取徑出發來重新思考東南亞的殖民教育。

因此，本研究希望藉此書院來探討東印度公司在新加坡統治期間的教育發展脈絡，藉此回應更廣大的帝國史問題，即帝國之中有著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而非以單純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來理解這段歷史。為此，本研究主要會從三個面向進行討論，首先是討論公司與書院之間的互動關係。接下來則從創辦者相關史料與書院報告切入以探討此時的教育理念。最後的章節會討論書院運作狀況，即主要從書院報告及其他史料來看書院學生背景以及書院教學內容，以思考教育理念與實際狀況為何。

二、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新加坡書院之關係

首先，本節將會從較宏觀的視角來討論公司與書院之間的關係，以理解書院在較大的權力框架下的運作。首先，現今研究已經強調帝國發展有著不同的動力，包含商業利益、道德與傳教熱情、以及國際競爭等，且參與帝國擴張的人員組成也非常多元，例如東印度公司、私人商人、傳教士、移民等 (Darwin, 2011)。不過，東印度公司佔領印度大片領土，並在亞洲各地有著不小的影響力，可說是將亞洲不少地方納入英帝國的統治下。為此，我們需要簡單理解公司的歷史與此時公司在東南亞的行政組織架構。1600 年，公司獲得特許狀而得以壟斷印度的貿易，並成為英帝國擴張時期非常重要的商業組織。18 世紀時，公司嘗試將勢力延伸到東南亞，以便與荷蘭東印度公司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VOC) 競爭，但無功而返。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出現頹勢，加上英國在七年戰爭 (The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中獲勝，所以英國在東方的勢力大增，並開始在東南亞建立據點，如檳榔嶼。後來，萊佛士於 1819 年登陸新加坡並將之置於英國的旗幟下，日後也發展為繁榮的港口城市以及成為英國在東南亞的重要據點。1824 年，英國與荷蘭簽訂英荷條約 (Anglo-Dutch Treaty 1824)，正式劃清雙方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而

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於 1826 年組成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Tarling, 1992; Stockwell, 1999; W. A. Andaya & L. Y. Andaya, 2017; 廖文輝，2017）。

關於公司權力結構的部分，公司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在倫敦的董事會，而公司除了有貿易專利權之外，他們在海外擁有統治與軍事的權力，尤其公司在 18 世紀佔領印度大片土地後，公司的統治性質愈發明顯。英國國會在 1773 年與 1784 年分別通過《規範法案》（The Regulation Act）和《印度法案》（The East India Company Act），以及後續一系列的法案導致公司從前高度自主的權力受到印度管理委員會（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的限制與規範，但是公司在海外許多實際且細節的活動操作上還是有著獨立性（Keay, 1993; Bowen, 2006）。在 17 世紀下半葉起，印度在公司的統治下分為三個總督區（Presidency），分別為孟加拉（Bengal）、孟買（Bombay）和馬德拉斯（Madras），孟加拉總督為印度大總督（Governor-general in India），統轄所有總督區。在 1826 年後，馬六甲、檳榔嶼與新加坡組成海峽殖民地，成為印度大總督管轄之下的一個總督區，成為第四個總督區，但在 1830 年降為府治（Dependency），隸屬於孟加拉總督區。因此，從地緣政治來看，新加坡與印度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最終，由於印度大起義（The Indian Mutiny）的爆發，加上公司長久以來的爭議，如虧損、貪污、貿易權開放等，公司的管轄區域在 1858 年開始逐漸歸由英國政府管理，而海峽殖民地也在 1867 年正式由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管轄（Mills, 1925; Turnbull, 1972; 廖文輝，2017）。

由於海峽殖民地在 1855 年後才有正式的報告出版，故在此之前的討論仍需仰賴各種不同史料來進行討論。首先，創建書院的計劃雖然被萊佛士提出，但一直沒有得到公司的積極回應，所以萊佛士必須想辦法與各方合作，如傳教士，關於這部分將在下文提及。萊佛士離開新加坡後，書院的計劃擱置許久。這是因為當時公司在海峽殖民地的統治力度小，只有很少的官員與警察來維持基本的統治。在沒有面臨統治權威的挑戰之下，公司不會也無必要涉入各個族群之中（Turnbull, 1972）。因此公司不但與當地人的關係疏遠，也不會贊助一些社會事業，如教育的創辦。此外，財政困境也是導致公司不願意贊助海外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 1820 年代，公司面臨嚴重的虧損，於 1825–6 年間達到 3,000,000 英鎊的赤字，由於公司董事會擔心這種情況會影響到 1833 年特許狀的更新，所以他們決定要減少預算以改善財務狀況。不但如此，雖然萊佛士登陸新加坡，但這其實讓公司董事會感到震驚，因為公司擔心新加坡的佔領會導致荷蘭的不滿與引發爭議，所以一直沒有放太多心力在新加坡的發展上 (Turnbull, 2009)。為此，以上種種因素導致萊佛士創立書院的目標難以達成。

1828 年，本廷克 (Lord William Bentinck, 1774–1839) 擔任印度大總督並開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其中一個措施就是決定把海峽殖民地納入孟加拉總督區中，以減少開支 (Cowan, 1950; Turnbull, 1972)。公司糟糕的財務狀況使得他們不願意再增加開支於教育事業上，新加坡的官員自然也不會把重心放在教育事業上。後來的新加坡駐紮官 (Resident of Singapore) 克勞福德 (John Crawfurd, 1783–1868) 甚至表示：「馬來群島的馬來人沒有相符的能力去接受萊佛士所設下的巨大恩惠……」 (Wurtzburg, 1954: 650) 這顯示西方人對東方人的偏見，也是因財政困難而不想給予書院資助的措辭，也讓書院的創辦擱置十多年的時間。

在財政艱困狀況下，後來成功開辦的書院如何與公司溝通以爭取資助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此除了看出書院藉由什麼策略來得到資助，也能看出公司的政策取向。在 1856 年出版的報告中就明顯指出書院是新加坡唯一的新教學校，為了負荷大量的學生，僅依靠私人的贊助是不足的。另外，書院也表示書院已經為政府或商業部門培養許多有用的職員。書院認為如果要繼續維持與提升良好的教育素質，原有的經費是不足的。此外，書院也指出他們失去許多的重要私人贊助者，因此公司每月 400 盧比是無法滿足書院的需求 (The Report, 1856)。不但如此，書院創辦一項提供給基督教青年的獎學金。書院表示此項獎學金是為了要鼓勵他們學習當地語言也在未來得以為政府工作，所以希望公司能夠每月給予贊助 (The Report, 1857)。這項獎學金的設立其實充滿著殖民統治的色彩，因為有的歐洲商人擔心華人通譯員會和會黨有所勾結，故有訓練歐洲新教徒、英印混血或葡萄牙人擔任通譯員的動機，進而保障他們的利益 (The Report, 1860; Song, 1923)。由此可見，書院從宗教的理由以及以培養「對政府有用的人」為主要說辭來說服公司能夠給予贊助，顯示

出書院的教育有著殖民的目的。

那麼公司是持什麼立場來看書院呢？在海峽殖民地 1856-57 年的報告中，他們指出雖然海峽殖民地沒有一所完全由政府負擔的學校，但是他們會在檳榔嶼、馬六甲與新加坡各贊助一所學校。報告中表示這些學校原本是為了基督徒年輕人的教育，不過後來有一些當地人想要學習英文，故也開放。因此，公司每月會贊助 400 盧比給書院（Jarman, 1998: 86-87）。從中可見，公司對教育的資助發展一部分是要滿足歐洲人的教育需求。此外，公司此時雖然是個商業與統治機能兼具的組織，上述所提的書院訴求也反映公司需要統治方面的人力，但公司此時面對財政困境，加上教育並無法立刻提供相對應的利益回報，所以公司並沒有給予教育事業太多贊助。

儘管書院一直強調書院能夠為殖民政府培養不少的人才，並以此為說辭來爭取更多的資金贊助。不過，公司在面臨經濟困境的情況下，公司給予書院的支持是很小的。這暗示了公司認為殖民地的教育成效不好又無法創造利益，加上公司的方針為不過多干涉當地社會，且給予的補助也似乎只是維持歐洲人的基本教育需求，故不大力發展教育。這也反映公司上下並沒有一致的立場，也暗示了殖民地教育的創辦與運營很大程度上是依賴私人力量，以及這種情況形塑了 19 世紀上半葉殖民地教育的樣貌，而這也將反映在下文中。

三、個人力量與教育理念

公司與書院的關係暗示了殖民地教育是以個人的力量為主。若要探討殖民時期的教育發展脈絡，相關人物的背景以及教育理念是不可被忽視的。本節將會著重相關人物進行討論，以探究公司統治時期的新加坡教育發展是出於什麼目的。由於書院曾被擱置，故本節將會分成兩個時段，即計劃初期與後來成功開辦時期來進行討論。

（一）新加坡書院的計劃

1819 年，萊佛士計劃要在新加坡建立馬來書院，並與當時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合併，共組新加坡書院。他為書院設立三項目標，且清楚記錄在馬來書院的規章中：

第一：教育高階層當地人的孩子以及其他的人。

第二：給予公司（按：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或其他有需要的人關於當地語言的教育。

第三：收集當地零散的文學作品和傳統習俗的資料，無論是描述他們的法律、習俗，並把重要的部分以正確的形式出版和流通，以及其他可以提高書院名聲和對人們有用或有啟發性的作品。（Formation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1823: 27）

這三項目標形成的時代脈絡如下。首先，萊佛士關注殖民地商業利益發展，並致力於將新加坡打造成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Turnbull, 2009）。不過，他把文明與商業做連接，因為他表示商業發展也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例如慾望、邪惡和腐敗，故教育須和商業發展保持一致，方能確保利益繼續存在並避免罪惡（Formation, 1823）。此外，萊佛士表示商人追逐利益時，政府應花費部分時間來傳播知識，並表示在有一定比例的人文明化後，英國人在當地的涉入會更安全和獲得更多利益（Formation, 1823）。此外，他也說明當地上層人士喜歡享受歐洲生活的奢華和舒適，並喜歡學習他們的舉止和禮節（Formation, 1823）。萊佛士表示當地上層人士經常與歐洲人接觸，而他認為這是當地人為擴大商業利益而做出的反應，因此透過教育能夠加深當地人與歐洲人之間的關係，進而讓他們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Formation, 1823）。另外，外國人學習當地的語言也有助於他們和當地人溝通，進而促進商貿活動的便利。可見，第一點和第二點目標與商業活動密切關聯，但這也顯示了萊佛士追求殖民地的穩定性，如確保英國人在當地的安全等等。這些都顯示了教育創辦是從殖民者的角度出發以獲取最大的利益，也展現了萊佛士的文明化目標。

第三點目標則和掌握當地的知識之企圖心與統治需求有直接關聯。萊佛士曾表示：「讓我們的思想 and 政策隨著帝國擴張而發展，這種對世界的看法和欽佩，不但是最偉大的，也是最堅定和最持久的」（Formation, 1823: 6）。因此，萊佛士認為他們應隨著帝國擴張而對自身想法與政策有所改變，方能鞏固統治，所以需要積極了解馬來群島的知識，而書院作為一個知識中心而被建立。這些知識顯露在殖民統治用途上，萊佛士曾表示調查一個地方應該包含商業、氣候、人口、外交、統治方式等資訊（Raffles, 1830: 606）。這也與當時的政治局勢有關，因為新加坡雖然落

入英國人的手中，但公司和英國政府並沒有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而是擔心會引來荷蘭人的抗議（Turnbull, 2009）。這顯示新加坡的發展初期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而這也讓統治者迫切需要去了解 and 掌握在地的狀況，以利於政策的制定和治理，更能證明公司統治殖民地的合法性。

從上可見，書院的創辦其實是為了滿足商業利益與統治需求，有著明顯的帝國意識形態。不過，萊佛士也與傳教士合作。英華書院的院長馬禮遜和傳教士哈京斯（Robert Sparke Hutchings, 1782-1827）都是新加坡書院的創辦人之一。當中，資源問題是讓兩者合作的重要因素。馬禮遜表示英華書院除了中英文的學習，也曾想要發展馬來語、爪哇語、暹羅語等其他語言，但中文與其他語言系統不同，導致中文教師與馬來教師間難以互相幫忙（Formation, 1823: 53-54）。因此，馬禮遜認為合併可以讓英華書院集中資源在中文教學，而其他語言和科學教育可交給馬來書院和科學部門來處理。以上狀況反映出殖民地早期教育方面人力資源的缺乏。阿都拉（Abdullah Abdul Kadir, 1796-1854）就是其中的案例。他曾在英華書院擔任教師與工作人員的馬來人，當他離開書院到新加坡工作後，他經常收到來信要求他回去書院幫忙。儘管他起初是婉拒的，但每隔三或四個月的來信請求還是讓他辭掉工作回到馬六甲（Abdul Kadir, 2009: 228-229）。

此外，萊佛士本身也有所考量，因為書院計劃沒有得到公司的贊助，所以他必須依靠其他力量來實現其理想，而已在當地先行發展教育的傳教士自然是他的合作對象。在馬來書院的人員組織架構中，傳教士佔據大部分的職位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中院長、校長、馬來教授、暹羅語教授和財政都由傳教士擔任，在所有教職和直接管理的職位中（Formation, 1823: 76-77）。可見，萊佛士相當程度依賴傳教士才能讓教育機構成功創建以及擁有運行下去的可能性。

為此，傳教士與殖民官員都缺乏資源，所以這促使他們合作以達到資源整合的效果。英華書院可以透過合併緩解師資壓力進而得以注重中英文教育，而萊佛士可藉由傳教士作為師資和管理人員，並利用他們在當地辦學的經驗來推動書院發展。不但如此，這也提醒我們說帝國之中有著不同的行動者，以及殖民者也並非是一個整體，甚至公司內部也並沒有一致的理念。馬來群島早期教育發展的推動主要是依靠個人力量去

推動的，而他們分別是作為殖民官員的萊佛士以及傳教士馬禮遜。儘管雙方背後的目標可能有所差異，但海外殖民地資源的不足，促使兩者之間合作，也讓新加坡早期教育有著發展的可能性。

（二）新加坡書院的正式開辦與運作

萊佛士離開新加坡後，繼任的克勞福德不但沒有給予書院協助，甚至抱持著敵意，故書院會議再也沒有召開。書院董事成員大多是商人或官員，他們只關注商業利益，當初因萊佛士的召集而參與書院創辦，對殖民地教育發展其實無太大興趣，在無人主持大局的情況下，書院計劃被擱置。書院建築物在建成後被荒置，直到 1834 年才由新加坡義學會（Singapore Free School Society）利用辦學，才慢慢發展成今天在新加坡有名的萊佛士書院（Morrison, 1839: 108-109）。因此，本節主要探討讓書院復辦後的人員組成，以及透過書院報告記錄討論教育理念。

首先，根據書院歷年的報告所顯示，書院的院長（President）都由海峽殖民地政府的參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所擔任，而參政司是新加坡殖民政府中的二把交椅，地位僅次於總督（Governor）。¹事實上，院長只是個榮譽性質位子。歷屆院長中，只有新加坡第四任參政司 Thomas Church (1798-1860) 長期參與校務委員會（School Committee）和董事會（Trustees），而往後的參政司皆無參與其中。為此，殖民政府並沒有對書院運作有太大影響力。

書院的運作有兩層權力機構，分別為董事會和校務委員會。董事會的成員主要是延續萊佛士創辦書院時期的人員，擁有校舍所有權，而校務委員會則是 Darrah 辦校的委員會成員，擁有管理校務的權力。在 1839 年之前，這兩層權力機構互相牽制，直到在 1839 年的會議中決議，校務委員會所掌控的資金和資產都轉移給董事會，而董事會每年將組成校務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中選出（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0: 3）。校務委員會成員因此失去權力，形成往後書院的行政結構樣貌。不過關於董事會人員的史料是不足的，且有不少人並非真正積極參與其中，如當時的一位牧師表示並非每位成員都對教育有很大的興趣與熱情，他

¹ 參政司的職位在 1867 年起改為輔政司 Chief Secretary，也稱為 Colonial Secretary，其在殖民政府中的位階依然是僅次於總督的存在。

甚至指出很多人對書院的興趣很少能超過 12 個月，有的甚至因疾病、本人不在殖民地或其他原因而不關心書院事務（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44）。

在此情況下，我們唯有從書院報告內容來切入，以期能部分顯露出書院的教育動機和理念。約在 1835 年，書院的首次報告出版，當中提及此書院的面向群眾，即「這是一個接受受尊敬（respectful）的父母之孩子入學的中央英文學校（central English School），但沒有任何的宗教區別的限制」（The First Report, n. d.: 1）。²從書院的定位來看，這所學校的受眾雖然不分宗教，意味著華人、馬來人等其他族群擁有入學資格，但卻限制身份背景，即「受尊敬」的父母之孩子才能入學，而這很可能限制許多人的入學機會，但「受尊敬」的定義在報告中並無解釋。

此外，書院的教育理念和當時海外殖民擴張背景有所關聯。在書院的首次報告中記載：

大不列顛的崇高是因為教育、道德和知識的廣泛傳播，而在教育方面，我們必須改善和啟蒙全球的黑暗與未文明的地區。這場偉大的計劃已經準備好了！願偉大的步伐在所有國家被榮耀和慈祥的光芒照射前都不會停止。

此刻值得永遠被讚揚的事實是，數以萬計不同膚色、不同宗教、不同種姓——大不列顛的臣民——都很大程度地在政府的恩惠下享受著免費的道德和宗教教育的好處。這就是一個統治者的責任和良好的政策，讓教育和勢力的擴張保持一致，以便讓人民在智識上得到提升，讓人們可以得到感激和尊重，並確保道德的影響在武力統治力量較弱的地方得到保證。（The First Report, n. d.: 4-5）

從以上史料可見董事們認為殖民地教育帶來開化與啟蒙，他們認為帝國的部分地區是不文明且「黑暗」的，並覺得為這些地區人民帶來文明與教育是他們的「責任」與「恩惠」，可見海外殖民地的教育理念帶有帝國的偏見。他們也認為教育應隨著帝國擴張同時發展，如此才能維持住武力控制較弱之地方的統治，而這顯示教育為殖民統治服務的動機與

² 此文件年份因原件破損而無法辨識，但應為 1834 年末到 1835 年間出版。

目的。同年的報告也引述萊佛士當時所提的三個目標，並轉引萊佛士的商業與文明化的說辭，可見書院此時的目標與初期目標相去不遠（*The First Report*, n. d.: 5-7）。可見，書院的教育理念是在帝國擴張的脈絡下發展的。

此外，書院的理念部分是有基督宗教色彩的。書院 1856 年的報告中曾表示：「我們要知道書院現在是新加坡唯一的新教學校，自從 Same 先生的學校關閉後，有著不少的學生進入書院」（*The Report*, 1856: 11）。可見，宗教是學生選校的一個考量，例如新教歐洲人會希望自己的孩子進入新教學校學習。報告強調書院是新加坡唯一的新教學校，證明基督教在殖民地教育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傳教士是在海外殖民初期的重要教育推動者，所以書院擁有著基督教的色彩和理念也並非是奇怪的現象（*Ratnavadivel*, 2007）。在 1849 年出版的報告中的〈新加坡書院義學的規則與章程〉（*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第十點表示：「佈道站的牧師，同時被要求監督學生的世俗教育，也要傳授宗教教育給所有學校的孩子，若他們的父母不反對如此做法。」（*The Report*, 1849: 18）因此，傳教士不但管理世俗教育內容，學校也成為進行傳教活動的地方。

總的來說，書院的發展顯示出殖民地的現代教育發展是依靠私人力量所推動，而非公司。另外，宗教、文明、道德、商業、殖民統治等內容共同融合形塑書院的教育理念。無論是書院草創階段或後來的發展階段，他們的教育目的大體上都是從帝國視角出發。

四、新加坡書院的內部狀況

從上文的討論我們得知書院的教育理念帶有著帝國文明化的意識以及利益的考量，並夾雜著不同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但是這些教育理念是否有在書院的運行中得到貫徹，以及當地人有什麼對於書院有何反應，則是需要去進行討論的問題。首先，我們需要瞭解書院的教學架構。在萊佛士的原初計劃中，書院包含三大部門，即科學部門（*scientific department*）、中文部門（*Chinese Department*）以及馬來部門（*Malay Department*）（*Formation*, 1823）。不過在書院開辦後，其規模和結構都與原本計劃有所差異，即分為英文部門、中文部門與馬來部門，還有泰

米爾部門(Tamil Department)。不過，由於學生源問題，除英文部門外，其他部門的經營狀況皆不如意，甚至 1841 年的報告開始就沒有關於泰米爾部門的記錄(The Report, 1849)。接下來，本節嘗試從書院內部的運作分成兩個面向切入，即學生與施教的部分，來進行觀察與討論。

（一）學生來源

學生作為書院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透過書院的學生人數、背景等進行討論，可以得知書院的教育對象為何，也可看到在公司統治時期的書院與社會的關係。我們把觀察視角放大到整個新加坡人口狀況以探討書院是否在新加坡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於《英荷條約》的簽訂讓新加坡得以平穩發展，並成為繁榮的貿易中心，所以吸引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如英國人、華人、暹羅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等(Turnbull, 2009)。因 1849 年擁有政府的人口普查記錄，故以此為例進行討論，以探討新加坡的多樣人口與書院學生背景之間的關係。當年的新加坡總人口為 52,891，歐洲人佔 360 人，華人佔 27,988 人，而馬來人與印度人則分別是 12,206 人與 6261 人(Logan, 1850)。當時華人和馬來人的人口數遠遠大於歐洲人，但在 1840 年的書院出席人數中，中文班僅佔 30-40 人之間，而英文班卻有 130-140 人左右(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0)。不過，中文班的人數其實並不同於所有華人數量，因為書院報告明確表示有華人與馬來人出席英文班，而沒被記錄在中文班。因此，書院的分班記錄無法作為學生族群背景的標準。同年的書院報告是唯一有對學生背景做詳細記錄的年度報告，報告顯示書院共有 208 位學生，其中華人佔 70 人、馬來人為 50 人，剩下的則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學生(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0)。³但從比例上來看，歐洲人雖然佔人口少數，但他們卻是書院的主要學生來源，可見教育資源大多被他們所佔據。從這點來看，書院的運行似乎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為了提供海外歐洲人的子弟一個受教育的地方。

為什麼佔人口多數的華人僅有少數人到書院就讀呢？人口組成是一

³ 此處用 1840 年的書院報告是因為這是唯一有記錄族群人數的報告年份。雖然在比較不同的年份會有所落差，但比例變化不大的情況下，仍有討論價值。

大原因。1849 年末的人口普查顯示當時新加坡華人人口為 24,790，但大部分為勞動人口 (Logan, 1850)。⁴他們的薪資難以負荷書院學費，故較少華人有能力就讀。此外，因在新加坡開埠之初，大量華人男性移民到新加坡工作，故華人男女懸殊比例使得當時的人難以組建家庭。在 1849 年的人口普查中顯示城鎮中的華人男性為 12,053 人，而女性為 1251，男女比幾乎達 10 比 1，故可推測組建家庭者並非多數 (Logan, 1850)。此外，華人擁有自己的教育系統，即私塾，而這是書院學生來源的競爭對象。雖華人私塾教育是在 19 世紀 70 年代後開始大量增設，但之前並非所有的私塾會被記載，故有理由相信當時有著比目前所知更多的私塾。當中最為有名的莫過於祖籍福建永春的陳金聲所創辦的崇文閣 (1849) 和萃英書院 (1854)，而根據鄭良樹 (1998) 的判斷，他們施行中國傳統教育，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另外，這兩所私塾學堂開放給大眾子弟接受教育，後來學生與教師的人數增加，萃英書院更是在 1890 年代擴建以滿足需求。(鄭良樹, 1998)。由此可見，書院面臨私塾學堂的競爭使華人學生來源被分散，但由於其性質主要為中國傳統教育，故會到私塾學堂的學生主要來自對中華文化有所景仰的家庭。

相較而言，到書院求學的少數華人學生主要來自富裕的家庭背景。報告中曾註明書院有的學生是新加坡有名望商人的孩子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3: 3)。這些華商很大可能是土生華人。他們相比後來移民到東南亞的華人更熟悉當地語言與習俗，甚至有早年打拼所留下的基礎，故有資本從事商業或其他開發活動。海峽殖民地報告曾經記錄華人較為熱心讓孩子接受教育，讓他們可以用英語處理商業事務，而且有的華人甚至為了讓孩子得以更精通英文而送他們到英格蘭留學 (Jarman, 1998: 163)。由此推測，已有財力基礎的新加坡華商已經認識到多種語言與技能在商場或其他領域的重要性，也預見殖民地的未來必須與歐洲人打交道，加上他們與中國傳統文化已有距離，故有意識讓孩子接受英文教育，以在未來獲得更好發展。為此，他們並沒有讓孩子到私塾學堂接受教育，而是把他們送到提供英文教育的新加坡書院學習。

接下來討論馬來人的狀況，當時新加坡的馬來人人口數為 4,540 人，

⁴ 商人或職員 98 人、手工藝人 2,322 人、農人 8,426 人、勞工 8,303、僕人 335 人以及其他 5,306 人。

而馬來人也面臨與華人同樣的狀況，即勞工人口佔比超過一半，故大部分人口薪資不高（Logan, 1850）。⁵從人口來看，馬來人的情況與華人類似，但他們兩者之間有明顯的差異，即馬來人對於在書院學習的意願不高。馬來教師在招收學生的過程遇到很大的困難，就算成功招到馬來學生入學，他們的出席率也很低。雖然報告曾表示有兩或三個學生來自受尊敬的馬來家庭，而他們也顯示出學習的熱誠，故希望他們能夠作為良好例子推廣到較為底層的社群中（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1: 6-7）。可是數年後的報告顯示馬來人的數量不但沒增加，甚至馬來分部（Malay branch）的開辦遇到困難（The Report, 1849）。在馬來人不願就讀的情況下，書院報告甚至表示「眾所周知，馬來人是具有偏見和無知的種族，也對知識的進步毫不關心」（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1: 6）。不過他們並非真的如當時歐洲人認為般的對知識漠不關心。在馬來人的觀念中，英文教育是與伊斯蘭教信仰抵觸的。例如阿都拉曾嘗試說服其他馬來人來學習但碰壁，甚至有人向他的父親告狀。其他馬來人認為學習英文會破壞他們的信仰，而他的父親也不希望他繼續在英華書院工作與學習（Abdul Kadir, 2009）。這透露出馬來社會是排斥英文教育的，其主要原因與馬來人的宗教信仰有關，而類似阿都拉可接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人佔整個社會的極少數。

從中可見，書院很大部分的功能是為了提供歐洲子弟求學的地方，顯示教育不僅僅是為了統治需求，在實際面向也是滿足歐洲人本身的教育需求。關於在地人的方面，華人在接受英文教育的方面是比起馬來人是開放許多的，且入學者來自較為富裕或社會上階層的家庭背景。總體而言，書院為此新興殖民地提供教育機會，其學生主要是歐洲人與華人，馬來人則佔少數。書院除了傳教、統治等需求之外，很大部分原因是要提供當地的歐洲人教育。另外，一些有錢的當地人，尤其是華人，也主動選擇到書院開始接受西方教育以利於未來生涯的規劃，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將在地人民視為殖民教育中的被動者。

⁵ 商人 3 人、手工藝人 236 人、農人 450 人、勞工 2,757 人、僕人 361 人以及其他 733 人。

(二) 教學內容

透過書院的教學內容可以探討當中的教育理念發展或變化，進而去思考這些教學內容是否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發展狀況。由於英文部是書院最穩定運作的部門，故本文將重點討論英文部門所提供的教育，以探討英文教育如何影響新加坡的學生。書院所教授的科目可以反映出書院教育所著重的面向。首先，英文部主要教授的科目是英文、算術、地理、歷史、繪圖、博物學、自然哲學等，可說相當全面，而不同班級在教授內容的難度與廣度都有所差異。以 1845-8 年的報告中為例，當中有記錄各個班級的課程進度，其中包括計算、馬來文翻譯、文法、作文、簿記、地理，另外還需要學習使用地球儀和航海相關的知識 (*The Report, 1849*)。

在眾多科目之下，我們可以看到教學中明顯的「實用」性質。當中，語言與算術是最常出現的科目。首先是語言方面，除了學習英文，馬來文翻譯也是英文部的上課內容。由於開辦學校者與大部分學生為歐洲人，故英文作為主要科目是不會有什麼問題。這也讓部分當地人開始接受英文的教育，使得他們擁有英文能力。翻譯則是書院較為特別的地方，書院教學內容包括把簡單的英文句子翻譯成馬來文，以及讓他們習慣於用不同語言進行思考與對話 (*The First Report, n. d.; The Report, 1853*)。這反映出語言在殖民地的重要性，由於新加坡人口組成複雜，故無論在商業貿易或政治領域中，跨語言溝通是必不可少的。書院培養學生相關能力，助於他們在商場或政府中有著相應的技能。若從教育的結果來看，學生的掌握能力應該不錯，因書院報告記載許多英文班學生可良好閱讀馬來文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0*)。因此，書院的畢業生，無論是歐洲人或當地人應具備在新加坡發展的語言基礎。這也反映了書院很大部分是為了滿足歐洲人的需求。

另外，算術也是書院非常重要且「實用」的科目之一。在 1840-41 年的年度報告中記錄校內對各班的考核之數學科題目，這些題目充分展現出實用性以及進行交易的需要。考題中的數學題目可以明顯看到與商業的關聯性，當中有五題與價格或利率計算有關，而有三題與匯率換算有關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1841*)。從這些題目可看到殖民地的商業發展之興盛。這呼應當時新加坡作為東方的重要貿易港口之一，大量的商業交易在此進行，所以算術作為一個基礎技能，不但體現在一

般單位換算或價格的加減乘除，還有簿記等更進階知識，而新加坡對於商業貿易領域人才的需求展現在書院的教育內容中。正如上述所提及，新加坡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貿易繁盛的自由貿易港，且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此交匯，形成一個多元族群的商貿社會。簡言之，語言和算術作為書院最常見的科目，正是反映了新加坡在 19 世紀發展的盛況。

此外，書院作為一所歐洲人開辦的學校，其史地相關的科目自然以西方為主，不會有所謂「在地」的歷史與地理知識相關之教材。在歷史科方面，書院的教學內容明顯看出是以英國和西方，以及帝國的發展為重心。例如在 1855-56 年的報告中有記述一段關於史地科目的教學內容，其內容主要是關於羅馬帝國、英國史、印度史（*The Report, 1856*）。這些教學內容對於當地學生來說無疑是新奇的事物，也間接影響他們的世界觀以及認同感。書院的史地科目顯示出當時作為英帝國擴張的時代背景。由於英文班中有不少華人，所以他們在接受相關教育時也會影響他們的觀念。這些都會潛移默化影響一個人對世界觀的想像，而這也影響部分華人的認同。

從教學的角度來看，書院的實踐與理念其實有些微的差距，但沒有脫離殖民的脈絡。萊佛士的創建時所隱含的文明教化意識其實一直存留到後來的教學目標之中，但在實踐上有一些落差存在。首先，書院的發展規模並不如萊佛士所設想的那般宏大，因為書院並沒有發揮蒐集當地文學、法律資訊與出版的功能，也沒有成為萊佛士理想中的知識中心，反而發展為純粹的教育機構。第二，書院的學生以來自世界各地背景的學生為主，儘管也有一些當地的富家子弟來接受教育，但這與萊佛士所提的「教育高階層當地人的孩子以及其他入」仍有一定的差距。此外，書院也沒有作為東印度公司職員學習當地語言的機構，這暗示了書院的現實運作與當時萊佛士強調的統治功能是有落差的。此外，教學內容除了實用性質的科目展現出當時新加坡的商貿活動的需求，英國、歐洲與帝國相關的史地知識反映出當時的英帝國擴張的時代背景。當地學生的時空概念隨之擴大，且認同感也有可能因此隨之有所改變。其中，書院有不少華人學生在英文部門學習，他們在此類教育的耳濡目染之下，他們的認同感可能會偏向英國。這影響後來的新加坡政治，即土生華人由於效忠英國，使得他們成為殖民政府的合作對象，除了讓他們擔任部分

的公務人員，也讓他們作為「以華治華」的重要角色（莊國土、劉文正，2009）。

不過，殖民的西方教育通常被認為其原本目的是於培養公務員或技術人員等以利於他們的統治（廖文輝，2017）。可是，在 19 世紀初的時候，狀況是更為複雜的。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中，馬來人由於宗教的因素而拒絕接受西方教育，而這批華人較為富有，能夠負擔教育支出，且在當時的商貿活動的環境之下，他們選擇讓孩子到英文教育的書院就讀，以讓他們得以在日後有所成就。但是在教育內容的影響下，他們的時空認知與自身認同感受影響，從而造成日後英國人利用這點，形成土生華人與英國人合作的政治與社會局面。另外，我們要記得的是此時公司並沒有參與其中，而這暗示了英帝國內部並非是單一的結構，而是多方互動的產物。

五、結語

在 1857 年的印度大起義（Indian Mutiny）的導火線之下，公司於 1858 年解散，在經過長期的交涉後，海峽殖民地正式於 1867 年 4 月 1 日改歸由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管理，成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書院也在這段時間從新加坡書院改名為萊佛士書院，雖然名字的改變動機不得而知，但卻也恰好呼應到時代的改變，而新加坡的教育發展也逐漸往下一階段發展。

從 1823 年到 1867 年間，書院的發展大致上的方向有一些落差，如其後續的發展規模並非如萊佛士所期待那般的宏大、其教育對象由於現實狀況而有所差異、以及其統治功能不再那麼明顯。不過，書院目標所蘊含的帝國與文明概念是一直存續下去的。透過此時段的書院發展為例子，我們得以更清楚了解公司統治時期的教育發展脈絡，進而讓我們反省目前研究的不足之處。首先，早期殖民地的西方教育推動雖然處在帝國擴張的框架中，但當中的發展過程是不易的，且主要以個人力量為主，雖然推動者為殖民官員，但其背後作為統治最高機構的公司卻因為政治與財務的實際因素而無給予教育發展支持。這也促使傳教士和萊佛士合作，反映了 19 世紀初期殖民地教育發展的不易。

此外，書院的創辦與教育理念或是教學內容其實都可置於帝國擴張

的背景下，即為了商賈、統治、文明優越感等。不過，我們也不能全然用殖民壓迫的觀點來進行解釋。這是因為書院也很大原因是為了服務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也讓新加坡社會的人群也因此得以有機會接受西方的教育，在地人也有主動性決定是否參與其中。華人因較為擁有資源而得以參與其中，進而影響他們的認同感與能力，並在日後的政治與社會中發揮影響力。為此，無論是教育的想法或教育的內容都是交流的產物，而非是歐洲人單方面的強制帶入，雖然西方擁有著偏見與權力的壓制，但在地人的能動性是不容忽略的。

書院的運作雖處在公司的管轄之下，不過若說書院發展的目的單純是為了統治需求則有失偏頗。儘管書院在爭取資助的過程中利用以培養政府有用的人才為說辭，但公司方面由於財政上的困境以及認為無法透過教育能夠立刻取得回報，依舊維持對教育的冷感。因此，儘管教學上的導向確實有以商業與管理為重，但這更多是私人界對此的需求，而非公司有意推行的。此外，我們不能忽略新加坡社會內部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新加坡社會內部的反應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華人因擁有足夠的資本且擁有意願的情況下而選擇接受西方教育，間接影響新加坡日後的政治版圖。

總的來說，新加坡書院的歷史揭示了新馬殖民早期的教育發展面貌，當中雖然有帝國的影子在其中，但當中包含了不少行動者，如官員、傳教士與在地人等的配合才能得以發展，也顯示公司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當中，書院創辦的理由是複雜的，除了殖民統治、傳教之外，也提供了海外歐洲人一個教育的場所，也成為了當地人尋求更好的機會的一個墊腳石。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藉此案例能夠對反思帝國與殖民的歷史，藉由觀察到不同群體的能動性以反思過往對將殖民等同於壓迫者的觀念，以及帝國內部並非是鐵板一塊，進而思考到帝國力量在殖民地的歷史發展演變。

參考文獻

• 史料文獻

- Abdul Kadir, Abdullah bin. 2009. *Hikayat Abdulla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trans. A. H. Hill, reprint No. 29). Malaysia: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Jarman, Robert L., ed. 1998.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ume 1: 1855–1867*. UK: Archive Edition.
- Logan, J. R., ed. 1850.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Vol. IV*. Singapore: Kraus–Thomson.
- Morrison, Eliza. 1839. *Memoir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F. R. S., M. R. A. S., Member of the Society Asiatique of Paris, &c. &c. Compiled by His Widow; with Critical Notices of His Chinese Works, by Samuel Kidd,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Original Documents. Vol. 2*.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 Newbold, T. J. 1839.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iz. Pi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a History of the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Volume 1*. London: John Murray.
- Raffles, Lady Sophia. 1830.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F. R. S. &c, Particularly in the Government of Java, 1811–1816, and of Bencoolen and Its Dependencies, 1817–1824; with Details of the Commerce and Resources of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Selection from His Correspondence*.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 Formation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A. D. 1823*. 1823. Malacca: The Mission Press.
- Second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Schools*. n.d.
-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Sixth Annual Report, 1839–40. With Appendix*. 1840.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Office.
-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Seventh Annual Report. 1840–41. With Appendix*. 1841.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 Eighth Annual Report. 1842-43. 1843.*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Schools. n. d.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 The Third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Free School, 1836-37. 1837.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44. Singapore School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August, 29. NLB NewspaperSG, Reel Number NL 1559.*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 for the Years 1845, 6, 7, & 8. 1849.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Office.*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 for the Year 1853. 1853.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 for the Year 1855-56. 1856.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 for the Year 1856-57. 1857.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Office.*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 for the Year 1857-58. 1858.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Press.*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Schools for the Year 1859-60. 1860.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Schools for the Year 1860-61. 1861.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Schools for the Year 1861-62. 1862.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 Th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Schools for 1862. 1863.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 近人著作

莊國土、劉文正。2009。《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莫順生。2000。《馬來西亞教育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林連玉基金。
- 廖文輝。2017。《馬來西亞史》。馬來西亞：馬來亞文化事業。
- 鄭良樹。1998。《馬來西亞華人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Andaya, Barbara Watson and Leonard Y. Andaya. 2017. *A History of Malaysia* (3rd ed.). London: Palgrave.
- Ballantyne, Tony, and Antoinette Burton. 2005. Introduction: Bodies, Empires, and World Histories. Pp. 1-18 in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eds.,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 in World Histo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ayly, Christopher. A. 1989.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UK: Longman.
- Bowen, H. V. 2006. *The Business of Empire: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Imperial Britain, 1756-18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kley, Charles Burton. 1902.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Vol. I*.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 Cowan, C. D. 1950. Early Penang and the Rise of Singapore 1805-1832.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2): 2-210.
- Darwin, John. 2011.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ugh, G. G. 1933. Notes on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1(2): 166-170.
- Keay, John. 1993.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 Collins.

- Makepeace, Walter, Gilbert E. Brooke, and Roland St. J. Braddell, eds. 1991.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Vol. 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L. A. 1925. *British Malaya 1824-67*. Singapore: Methodist Printing House.
- O'Brien, Leslie N. 1980. Education and Colonialism: The Case of Malaya.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16(2): 163-187.
- O'Sullivan, R. L. 1988.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nd the Early 'Singapore Institutio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2): 45-62.
- Ozay, Mehmet. 2011. A Revisit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System in Malaya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World Journal of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1(1): 37-48.
- Porter, Andrew. 1999. Introduction. Pp. 1-28 in Andrew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tnavadivel, Nagendralingan. 2007.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Peninsular Malaysia*. Perak: Penerbit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 Song, Ong Siang. 1923.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 Stockwell, A. J. 1999. British Expansion and Rule in Southeast Asia. Pp. 371-394 in Andrew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rling, Nicholas. 199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onial Régimes. Pp. 5-78 in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Two: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rnbull, C. M. 1972.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67: Indian Presidency to Crown Colony*.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 _____. 2009.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 Wijeysinha, Eugene. 1963. *A History of Raffles Institution 1823–1963*. Singapore: University Education Press.
- Wurtzburg, C. E. 1954. *Raffles of the Eastern Isle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Singapore Institution (1823-1867): The British India Company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Chang Kai Wen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ingapore Institution (which was renamed Raffles Institution in 1868)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period (1823-1867). In this case stud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text, goals, and impacts of the colonist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helps us to reflect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colonial education. The primary historical source is the annual reports of Singapore Institution, which are analy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any funding, educational ideas and student backgrounds, as well as educational content,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edu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also answers the broader question of imperial history, that is, by emphasising that the coloniser is not entirely an oppressor, and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various groups, which in turn reveals that the empire itself is not a monolithic entity.

Key words: Singapore Institution,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Education, Imperial History